

貴州學者文選

「第一輯」

貴州學者文選編輯出版委員會



吳雁南 文選

# 史海深潛

吳雁南 著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

2017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慕德贵

成 员 顾 久 徐 静 谢 念 朱新武

黄定承 宋 健 苏 桦

办公室主任 谢 念 朱新武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部

主 编 乐黛云

执行主编 顾 久

成 员 张新民 翁家烈 冯祖贻 何光渝

谢丹华 戴 冰 王尧礼 戴 俊



吴雁南（1929～2001）

重庆市荣昌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专修科。1954年起，在中学任历史教师时就开始发表文章并参与编写全国历史教材。1962年调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年调贵州工作。曾担任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贵州师范大学校长。是国内中国近代史领域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六卷本《吴雁南文集》等。曾当选中国史学会第三、四、五届理事，贵州省史学会二、三届会长等省内外20余项学术兼职。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

## 总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基本的、深沉的和持久的力量。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腹地，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当中国进入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历史阶段，人们从对贵州的“传统”识读转变为对贵州的“现代”惊喜。在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中，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百姓富、生态美的景象犹如灿烂的画卷徐徐展开。而这一变化，很大程度缘于贵州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缘于贵州人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文化力量支撑，缘于对文脉的持续夯实和丰富延展。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智慧扮演着引领社会进步的角色，而作为智慧的载体——人，或以细微力量奉献于故土，或以毕生所有倾力于建设，或以所拥学识聚焦于文明。贵州大地曾经出现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人文景象，一直激励着后人励精图治，奋发赶超。在各个历史阶段，贵州涌现出一批批执着于家园建设的热血男儿、巾帼英豪。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贵州学术繁荣发展，人才辈出，新作迭现，在省内乃至海外成长起一批成果丰硕、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山川风物的每一点变化，人文气韵的每一点累积，无不昭示“贵州精神”“贵州智慧”的现实呈现，折射出时代潮涌背景之下贵州人的专注与努力。

以此为情感触发点，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指导“贵州学者文丛”（以下简称“文丛”）编辑出版，旨在树立和刻画让人敬仰的人文景象。“文丛”邀请了在当代学术界有影响力的贵州籍或者非贵州籍但对贵州有研究的学者，整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承前启后，激励后人，放眼贵州，观照世界，让贵州的形象闪亮，让贵州的声音响亮，让贵州的智慧铮亮。“文丛”的作者既包括如乐黛云、陈祖武、刘纲纪、涂纪亮、曹顺庆、刘扬忠、刘扬烈、何光沪、张朋园等贵州籍的著名学者，又包括非贵州籍但在贵州生活过的专家学者，如钱理群、吴雁南、彭兆荣等，博采众家之长，集中展示贵州文化之风貌。“文丛”在内容上，以文史哲为主，同时又兼采风物；形式上，在保证萃选诸学者的学术精华内容外，兼顾通俗性，以扩大“文丛”的读者覆盖面。

感谢“文丛”的全体作者及其后人，他们客观严谨的学术创新精神、浓烈的乡梓情怀、无私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我们用真心、细心、诚心来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支点，值得我们用心、用力去寻觅和追求。希望本“文丛”的出版，能弥贵州文化之气韵，能彰贵州精神之亮点，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添砖加瓦、催波助力。

“贵州学者文丛”编委会

2018年4月

## 代序

### 仰望学术丰碑

#### 编辑《史海深潜——吴雁南文选》之思

无论是讲因缘，还是讲必然与偶然，也许是前世千百次的擦肩而过，才换来今生与吴雁南老师的相遇。从相遇到相别的 25 年间，他知我教我信我；我敬他学他爱他，事实上却并不全然了解他。感谢“贵州学者文丛”编辑委员会的信任，更切记吴雁南夫人何正清老师的殷殷嘱托。在选编他各时期各领域的代表作时，我像面对云遮雾绕的高山，虽仰视却不识其峰之高峻；也像濒临浩渺无际的静水，虽凝望却不知其流之深浅。我以虔诚的步履，去丈量他的学术历程；我用初学者的心态，去体认他的博大胸襟。我似乎才看清他用德、才、学、识奠筑的史家丰碑之挺拔伟岸，才更深切地感悟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宽广深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行文时都称他为先生。而我因习惯成自然，从相识到而今乃至而后，都仍叫他为吴老师。虽然流于俗，反而顺心顺口、自然亲切，故文中也不想求雅而改称他为先生。几个月来，他就在我眼前，在我心中，依然笑容可掬、儒雅谦恭，说话做事总是慢条斯理，不愠不怒，举重若轻，慎笃好思，博闻强识而又谨言慎行。

我与老师的相识，有缘有分。1966年7月，我毕业于今贵州师大的前身——贵阳师范学院。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横扫一切了，我历史系毕业后原望考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生轨迹由是中断，后来被分配到兴义地区师范学校（今黔西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前身）任教。该校不缺历史教师，而我自幼喜欢绘画，又喜欢文学，我遂成了该校的美术教师兼语文教师。1977年，贵州各地区都要筹建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四人帮”刚粉碎不久，百废待兴，全国都没有大专的历史教材，于是，学校便分配我设法编写中国通史的教材。自然就先到母校寻求帮助。我到曾教过我们中国古代史而又特别喜欢我的胡克敏老师家求救，胡老师自然把他能提供给我的资料都给了我。但他认为他所能提供参考资料太有限，主动要引荐我去拜会我们离校后才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放”到系上的吴雁南老师。他说，只要有吴的指点和帮助，我领受的任务定能完成。胡老师将我带到吴老师家，我并没有感到拘谨。不知是前世修来的因果，还是今生注定的缘分，吴老师和他夫人何正清老师让我一见如故，待我如家人一般。我说明来意，吴老师不仅给了我一套中

国通史的本科教材，还教我如何保留主线、框架，删繁就简，使之适合师专使用。我刚编写完一套师专的中国通史教材，便遇上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招考研究生，因此捡了个便宜，顺利进入研究班学习。1979年5月，省里批准成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我们这批研究生结业后大部分留院工作。我就留在历史研究所，从此成了吴老师的门外弟子。在参加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老师任中册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编注索引的工作中，我开始接触到包括隗瀛涛先生在内的史学名家。在参与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西南军阀史研究”的工作中，在参加老师主持的宣讲中国近代史并参编讲座教材的过程中，在参加老师任总主编的《中外历史新编》编写会上，以及接待国内外史学家的过程中，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凡是有我和老师同时参加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老师都要把我介绍给他所熟悉的史学名家。于是，我认识了戴逸、金冲及、彭明、来新夏、张宪文、张海鹏、林家友、陈旭麓、路遥、戚其章等一批中国当代的史学名家，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们有了较多的联系。特别是由于老师之介，我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有了初步的交往。老师既是我进入学术之门的引路人，又是我能够登堂入室的推荐者和提携者。特别是1988年奠定我学术基础的《何应钦传》书稿完成后，老师欣然为我作序，与我同担了当时相当大的非学术的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他让我协助他带研究生，并为他们开讲座，聘我为贵州师大文化研究室兼职教授，多次担任他所带的硕士生论文

答辩委员会委员，参与他主持的贵州名人名家口述历史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与其说我协助他，不如说他在带我。老师的良苦用心，我是深铭肺腑的。

几个月前，当我接到何正清老师和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电话，要我负责“文丛”中吴雁南文选的编辑任务时，我明知其难，力有不从，但没有丝毫犹豫，作了“于公于私我都会尽力”的表态。我确实尽力了，但未必能如何老师和出版社之愿，难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

我没法去穿越吴老师经历过的73年的岁月，我比他小15岁，虽也对“肃反”“反右”等运动有模糊的记忆，尤其对“文革”的浩劫有糊涂中的清醒，却没法感受吴老师、何老师伉俪所遭逢的极“左”横行的际遇。在选编“文选”的过程中，我不可能卒读经何老师和他门内弟子们初步整理出版或存档的文章378篇，译文4篇，独著或主编的著作、教材23种，参编的著作、讲稿、讲义等总字数超过1800万的著述，更无时间与精力去涉猎收藏在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里的信函、书法和蜡染作品。我只能在我所熟悉的领域，在别的学者整理和研究他的阶梯上去俯拾即是地选择我以为能代表他的学术水平的文章编入“文选”。由于“文选”规范所限，吴雁南文选就难以求全，更因我的学识局限，吴雁南文选更难求准求精了。吴老师的一生，便是一部煌煌巨著，我在他辞世14年之后，重新去读这部巨著，可能情感更胜于理智。我以为这是一种可以谅解的偏执和过失。因为发自肺腑的真情，寄托着对老师在天之灵的慰藉，他不会责

备我的。再从读者的角度去看，不同年龄、不同旨趣、不同视野的人，去读吴老师的作品和他这个人，定会得出不同的它和他。我所选入吴雁南文选的文章，着重于学术的视野，所选的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的代表作，未必都能真的是“代表”，我只能凭我的心智去选择或割舍了。那些在国内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他独著或主编或合著的长篇巨制，只能在本卷的《学术年表》中存目，供有心的读者去检索了。本卷能让一般读者去管中窥豹，虽只见一斑，也足显其庞大。而真正的研究者，除了去精读吴老师的原著原作外，还可去读《吴雁南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6卷本、总字数达200多万字的《吴雁南文集》，以及他的弟子和其他学者研究他的著述，特别是吴老师弟子陈奇教授主编的《吴雁南评传》。这些著述为我的选编工作提供了门径。若要认识思想睿智、为“官”清廉、为人谦和、情趣丰富、灵肉鲜活的吴雁南，还得去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中研究那些尚未发表或鲜为人知的“编余”资料，定能淘得真金，取得真经。

热情是火，勤奋是薪，燃烧着吴老师的智慧和潜能，烛照着中国史坛，更引导着数以百千计的门外门内弟子，去探寻历史的真实。吴老师对历史的钟爱，使他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2001年8月7日他在临终前夜，还与关门弟子谈论毕业论文，足见其对学术的痴迷、对学生的负责和对教育的担当。

吴老师1929年2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荣昌县吴家镇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自然得到良好的书香家风薰染。他10岁始入

小学，3年后便考入县城私立伯桥中学，因学业优等，只读了5个学期又考入省立成都高中部学习。1948年9月，他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在川大法律系学习期间，吴老师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何正清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师决意另觅新校，学习他自幼就喜爱的文史。1950年秋，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专修科，从此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他于1952年秋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师大附属中学任历史教师。东北师大有学贯中西的名师云集，该校附中向以教学科研并重，这使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能够刻苦攻读许多当时的名家名著。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在1954年的《历史教学》1月号上发表了处女作《在历史教学中的几点体会》。学术闸门既已打开，历史智慧的泉涌便奔流直下。他先后在《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战线》《吉林教育通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系统地阐发自己对历史教学中的教材、教学、考核诸环节的独特见解，受到各有关方面的关注。1960年他被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中学历史教材编辑。从此，全国数十年间所使用的外中历史教材，都不乏吴老师的贡献。

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并没有妨碍他在学术上的适度超前性。1957年，年仅28岁的他在《史学月刊》第8期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试论太平天国起义前洪秀全的政治思想渊源》。之后，他相继就太平天国的土地问题、政权性质、制度架构、人物评价等问题发表系列文章，既挑战了权威观点，又自成一家之言，得到史学界的肯定和认同。著名史学家荣孟

源先生对吴老师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头角崭露，大加点赞：“后生可畏，后生可嘉。”吴老师文章中所挑战的，正是荣孟源、罗尔刚等学术权威。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脱颖而出，除了他过人的治史者的秉赋和勤奋外，诚如他自己所言：在京工作的十余年间，他结识了大批学界名流，且有许多同辈学者成为他的莫逆之交，为他尔后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大展鸿图，积聚了厚重的学术人力资源。他曾经回忆说：“我这一辈子运气好，遇到许多老师。首先是荣孟源、罗尔刚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得以在史学界蹒跚起步。我的许多论文，亦多次得到著名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先生的指导，使我在研究史学上得到宝贵启示。”（转引自《吴雁南文集·序·书评·其他》第6卷，第296页。）这也体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学术薪火传承，亦是当代史学界应当去继承弘扬的优良传统。

吴老师庆幸自己的运气好。其实，人人都知道“机遇是给予早有准备的人”这句名言或者俗语所蕴涵的道理，但不是人人都能像老师一样早有准备蓄势待发。

荣孟源先生针对吴老师所发的“后生可畏，后生可嘉”的点赞并非只针对一时一领域，而是印证了上世纪吴老师40多年的学术造诣，同时也反证了老一辈学人辨才识才用才的伯乐眼光与胸怀。继太平天国史领域他勇立潮头之后，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经学史研究、阳明心学研究，特别是担任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后对高等师范教育教学研究以及中国历史知识的普及等领域和方面，他的可畏可嘉都一以贯之。

他的许多著作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并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权威报刊的宣传推介享誉海内外。如他主编的4卷本共213万余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出版之后，便被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创举。

《中国日报·北京周末》外文版发表长篇书评，向海内外推介；《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笔谈，称其“创新之处颇多，是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居国内领先水平”，“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可为21世纪的中国人提供借鉴。”（转引自《吴雁南文集·序·书评·其他》第6卷，第306—307页。）正如戴逸先生在该书卷首的题词中所称赞的那样：“囊括了近代的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揭示了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历史合力。该书系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在结题出版前，我有幸成为该课题的专家鉴定人之一，在鉴定意见中我曾写道：该课题“以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突出了各种思潮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从物质、制度、运作和思想文化四个层面上，对近代中国出现过的50多种社会思潮或思想进行了立体的、多层次的解剖，启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其研究的辐射力远远超过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领域。”我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和贵州文化史研究上，得益于这部巨著的地方难以细数，它在某些方面甚至对我有启蒙的价值。

我深感自己没资格就吴老师对贵州学术乃至中国史坛的影响作准确的价值判断，因为当代中国一流的史学家们对他的成就早有如实的定论和高度的赞誉。这不是在他逝世后的吊唁之词中才有的赞誉，而是在他生前跟踪他的学术步履时，史学家们就认定他是中国史学界卓越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关于他的学术造诣水平，贵州还闹了一个笑话。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间歇中，国内一流的几位史学家对我说：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吴雁南领衔申请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你们贵州省教委在他的申报表上填写意见时，竟然十分谦虚地认为贵州贫穷，教育落后，学术水平有限，希望评委们给予照顾。国家学术委员会的评委们看了这样的推荐意见都感到可笑。大家认为吴老师的学术水平在全国都是一流的，申报个硕士导师还需要照顾吗？我听后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慨。我也曾多次设想过：假如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吴老师、何老师夫妇断不会“下放”到历朝历代贬官谪戍地的夜郎故地，那么贵州学者在当今中国史坛上能有今天的影响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王阳明被贬谪到贵阳修文，有龙场悟道的石破天惊之举，因而构建了以他为代表的明代中国儒学的巅峰。王阳明之后的500多年间，贵州虽代有才人出，但能够与国内一流学者比肩者，近代只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3人。当代学者中，我以为在史学领域非吴雁南莫属。有学者们称赞他“雄踞西南，遥控中原”，但他不是学阀，而是希望年轻学者能超越他的良

师益友。所以，他对每一位他的研究生和他所结识的省内外的求上进的年轻史学工作者，总是殚精竭虑地教育、鞭策、提携、奖掖，帮助他们登堂入室，在中国史坛上有一席之地。我以为贵州迄今并没有人在总体上能超越他。国家和贵州省给予吴老师诸多殊荣，并任命他为贵州师范大学校长的深思熟虑之举，也是这次编辑出版“贵州学者文丛”，把他列为贵州史学界首选人物的深意所在。希望他对当代和后世都是一个标杆、一种学术引领。

对于每一个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学者而言，没有遗憾的人生，似乎都是不完美的。残缺才是人生的最美。

同吴老师交往的日子里，我知道他一生中还有两大遗憾：

一是因为肺癌手术成功后再度转移复发，扼杀了他已经酝酿多年，早已成竹在胸的《中国社会思潮通史》的鸿篇巨制。他计划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基础上，上伸下延至古代和当代，将中华悠久的传统思想文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如洪波涌起，或暗流渗透的各种社会思潮有机地链结起来，为培育当代的主流价值观提供借鉴。他在与病魔抗争中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及研究路径、写作构想，一定会有后之来者去完成他未竟的“中国社会思潮通史”研究。所以在老师的灵堂前，我才献上这副挽联：“先生去也，古史残卷谁能续，岂惟蜀水哭声重；吾侪来者，新书一篇我难写，顿觉黔岭太息多。”这绝非应景之作，而是我与老师在生死两界间的心灵沟通。

二是他作为当代贵州史学界和高等师范教育界的领军人物，